

李霽野文集

—



李霁野文集

一

百花文艺出版社

李霁野文集

(一)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 1/8 插页2 字数37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06-0849-5 / I · 762 定价: 10.60元

自序

在故乡叶集明强小学毕业后，我于一九一九年秋季考进了阜阳第三师范学校。一方面因为是公费，我可以上得起，一方面也因为我对小学教育很感兴趣，愿终生从事这种工作。阜阳当时虽然很闭塞，我们有几个人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了，喜欢阅读宣传新文化，用白话文印行的书籍和报刊，如《新青年》，《少年中国》，有副刊《学灯》的《时事新报》和有副刊《觉悟》的《民国日报》。有一部分同学是反对我们的，教师几乎全支持他们，但斗争只限于张贴点外来的宣传品，参加的人数两方面都很少。

我们这方面外来的声援是在武汉读书的几个小学同学，影响他们的主要是恽代英。我也给他写过信请教几个问题，他回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导我们怎样读书和做人。声援他们的有一二第三师范毕业生，也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书，他们有时写来些攻击“洪水猛兽”的四六文。我们在武昌的同学倡议同办一个刊物《新淮潮》，都用白话文，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短文，现在连题名也忘记了，只记得大意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切切实实做事。

这原只是一点小小的矛盾，不料却被一个刘某所利用，排挤几个新派的人。这几个人中有比我进校早一年的陈素白，进校迟一年的韦丛芜。他们在学期开始时就病了，按规定住进了疗养

室，只是为避免传染，条件并不优越。我护理他们，很少上课，根本谈不上其他活动。快到学期终了时，他们的病总算好了，来看望的同乡渐多，免不了欢笑。一天晚饭后，钟声大作，有人通知我去开会，原来由刘萼一人出面，指责我们霸占疗养室，搞阴谋活动，也就是要把“洪水猛兽”引进三师。没有人响应他发言。我觉得气愤，也觉得无聊，便同韦丛芜一起退了学。

冬季在家里时间充裕，也没有很多书可读，便想看看三师高年级所读的英文课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写《天方夜谭》。翻查简单的英汉字典，可以看懂故事的梗概。这本书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比读过的几种中国旧小说更引起我的幻想。我极想学习英文，以便多读这类的书籍。但是我这时还没有决然走文学道路的意思，我仍然希望以小学教育作终生的事业，因此决定到安庆去转师范学校。可是师范学校是公费，有地区限制，转不成，中学又上不起，只好辍学而不放弃自修了。韦丛芜也和我同到安庆了，他的大哥创办了一个商品陈列所，找一些商店集中到那里开业，结果只有一家小古董店，店主是个五十来岁的人，每天喝点酒，反复只吟诵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想他确实欣赏的只是首句，其他全不相干，而我对于葡萄美酒不感兴趣，对于沙场毫无所知，他究竟比我胜过一筹。至于诗嘛，我虽然略读过几首，但对诗的兴趣还并不甚浓厚，所以对他能百读千读不厌，私心里倒也有点佩服。此外商务印书馆在那里设一个售书处，我做义务店伙，不化钱可以读到一些书，我至今觉得是一件美差事。

安庆出版一种《评议报》，我们不知道怎样结识了一位编辑宋君，谈妥每周附出一张副刊《微光》，文章都是韦丛芜和

我写的。这个周刊另印单张若干份，由我们自己到街上去散发给女青年学生，因此也许会引来一点议论，但我们毫不介意。以后《微光》又改在《皖报》上附出。记不起一共出了几期就停止了。我在《微光》上发表的文字，只记得有一封公开信，要求解除家庭代订的旧式婚约，这在当时当地还是破天荒的事。我还写了些首日本式的短诗，这是受了周作人译日本诗的影响，现在只在文章中残留一二，其余的完全记不起来了。此前一年，我写过一首关于初恋的五言古体诗，也许这是真正的处女作，我倒一直还记得，写《流落安庆一年琐记》时，抄录到文中了。

一九二三年春，我到北京，一时没有学校可入，我便自修英文，那时条件很差，完全靠查字典硬啃。为维持生活并准备入学的费用，我只能靠那点半瓶醋的英文，编译一点短文章投寄给报纸换取点稿费。千字五角，一月能得八元至十元也就可以敷衍了。这些文字，即使我想再看看，也无法找到了。

这年秋季，我转入崇实中学高中读书，一位美国教师Henry Fein教我们西洋通史，选读两厚册英文课本，我觉得很有益处。我课外读些英文文学作品，倒也不觉怎样困难了。不过我所读的多半是英文翻译的俄罗斯作品，比较容易。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静农为我找到安特列夫的《往星中》英译本，我读后觉得很好。这是一个剧本，写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一个天文学家向往星辰，忘怀现世，专心从事天文学研究。他的儿子因为革命被捕，身受酷刑变为白痴，而其未婚妻却坚持投身现实，继续革命。这种对待现实的矛盾态度，我觉得颇可反映中国当时的情况。素园有此剧的原文本，愿意帮助我试译，我便作为练习，在暑假中给翻完了，他用俄文校

改一次。我们的外文基础都还很差，但我们是极为严肃认真的。我的小学同学张目寒将译稿送请鲁迅先生审阅，他第二天就看了，并约我去谈谈少数要修改的地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为印行这本书及其他几个青年人将有的译著，他建议成立了未名社。所以一九二四年是我的文学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

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出版了《民报》，鲁迅先生介绍素园去担任副刊编辑。我那时已经译完了美国房龙（Henrik William Van Loon）所著的《上古的人》（Ancient Man），便用笔名任冬将译文在上面陆续发表。但这个报纸只出了半个月就被张作霖查封了。以后我将这部译稿卖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得款百元，够我上燕京大学的部分用费。我想将已译出的安特列夫的剧本《黑假面人》卖去，凑够上大学的用度。鲁迅先生知道后，借百元给我，主张书由未名社印行。这个剧本充满了作者悲观主义的色彩，只印千册，声明不再版，记得有一位读者从日本来信表示惋惜，很高兴自己买到了一本。

我虽然上了大学，并没有好好读功课，能逃堂的课我就干脆不上了。我一面读点自己愿读的书，一面还译写点稿子支持未名社的期刊。有一位朋友想译一本以爱情为主的抒情诗集，请我也选读并择译一些首。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一本夏普（William Sharp）编的《爱尔兰歌谣集》（Irish Minstrelsy），极为喜爱，从其中选译了一些首，只发表一篇《他年的梦》，这连同其他一些译诗都丢失了。这本诗选以后从北大图书馆失踪，我多年在多处都没有搜求到。但是从此我爱读抒情诗，也陆续译了几十首，不过很少发表。前几年抄几首给一个期刊补白，还有青年读者喜好，在我已年近八十的时候，还在开会旅游时抽空又译了一些首，居然成为一本书《妙意曲》，可以作

为献给少男少女的菲薄礼物了。我知道译诗是十分困难的，我只是作为消遣从事，但印出来即使不是在大岁爷头上动土闹出大乱子，也是吃力不讨好。若是我的译诗不太遗笑大方，我就要多念几声阿弥陀佛了。

未名社印行的第一本书是鲁迅先生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书中论到Essay，说这种文体在日本还没有适当的译名。在中国现在译为“随笔”或“散文”，我以为前者较好。我对先生说，我比较喜爱这种文章，他劝我多读点英国这类作品，也可以试写。我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写随笔，中间有时空十年甚至二十年不写，所以几十年中所写的不过五十多篇，除一篇佚失外，集为《温暖集》。

苏俄十月革命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切遭到严密封锁，我们还是略知一点消息，我们的兴趣渐渐从俄罗斯文学转移到苏俄文学了。素园从当时在北京大学教课的俄罗斯诗人铁捷克得到一本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我也买到了英译本。当时这本书是苏俄大学的文艺学课本，我们因此想合译印行。可惜他一九二六年肺病大吐血，不能起床，当然不能执笔了。我因为未名社事无人管了，便从燕大休学，在孔德学校兼点课，业余独自译完了这本书，一九二八年四月由未名社印行。

这本书寄到济南第一师范代售，有人因此被捕，未名社遭到查封，一位朋友同我被捕关了五十天，常维钧多方找人营救才被释放。不久李何林同王青士逃难到了北京，一时很难找到工作，我们决定在景山东街开设未名社售书处，请他们暂时在那里安身，青士主要是做党的地下工作。

狱中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些读过的短篇小说，出来后我陆续

译了十多篇，结集为《不幸的一群》，在出狱一周年时由未名社印出来作为一个纪念。为期刊的需要，我选译了一些文艺批评断片，并译了《英国文学中的性表现》中的几章。这些译文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了。

未名社到一九二九年已经是外强中干的局面了，经济上渐渐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我并无起死回生的妙方，韦丛芜要来整顿，招聘了一个人经营，我便到当时在那里教课的孔德学院居住，实际上离开了未名社。我在未名社工作完全是尽义务，教书也很少能拿到工资，又有大家庭的负担，所以弄得债台高筑。我便决定译《被侮辱与损害的》，希望能够将译稿卖出去。一九三〇年夏书译完了，托人卖给商务印书馆，得稿费一千六百元，一部分为素园还了债，一部分寄给家里维持生活，肩头的重担稍轻，心情也就舒畅一些了。

经李何林和朱肇洛介绍，我一九三〇年秋应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聘任英语系主任，因为备课忙，头二年没有翻译什么书。鲁迅先生很关心，同冯雪峰谈到，以为我偷懒，我接雪峰信后，立即写信告诉先生我在译《简爱》。这本书于一九三五年译完后，由先生介绍给郑振铎，《世界文库》用单行本发表，得稿费八百元，作为我去英旅游的川资。

我在河北女师院最后译完的一本书是《我的家庭》，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收到我的赠书，还在日记上写记了。

天津被日本帝国主义扰乱，动荡不安，按照女师学院的清规，我也要辞职离校，所以我于一九三七年开始，翻译《战争与和平》，预备以后的生活以翻书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留住天津，继续翻译《战争与和平》，直到第二年秋应北平辅

仁大学聘去任教，业余译书，前后四年半译完了这部巨著。稿寄移至九龙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日寇进占时全稿丢失了。

在沦陷的北平几年，除译《战争与和平》外，本想办《北方文学》，已集了一些稿件，也有人为刊物画好了封面，但是日寇不准出版，只好作罢。我请景宋抄录鲁迅日记，原准备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她从外国银行保险箱取出日记，日寇去逮捕她，使日记损失了一九一二年的一本，我至今觉得是很大的憾事。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北平的形势日益紧张，辅仁大学有几人被捕，住在我前院的常维钧也失踪了，我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出走，经洛阳去重庆。谋得工作前，我译了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几篇短篇小说，集为《死后》印行，以后更名为《卫国英雄故事集》在解放后重印过。一九四三年五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到夏坝复旦大学任教，业余翻译了《四季随笔》，在一个期刊上陆续发表。我还翻译了几篇随笔，集为《忙里偷闲》，英汉对照印行。《虎皮武士》是一九四三年八月译完的，在重庆用土纸印行了二千册，在那时印数就算是不少的了。

在辅仁大学教课时，我抽暇读了些中国古典诗词，或许受了点影响，出走后到复旦，便喜欢在有些感触时，随手在报纸边上或眼前的纸上写一二首格律诗，主要为绝句。妻带两个孩子回叶集就食，在写信时我便抄录给她看看，毫无发表的意思。一九四四年三月我转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去教书，写格律诗已经有了点习惯，写得就较多了。那时我手边有一本菲兹简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鲁拜集》（The Rubáyát），我便试用五七言绝句译出了初版的七十五首。我教学生英诗选

读，并给一位朋友选讲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其他抒情诗，便随兴译了些首，未发表，以后译稿也丢失了。这时候比较闲暇，可读的书也不太多，倒有《全唐诗》和《全宋词》，因此我们的生活便颇受一点诗的陶冶了。

我手边还有一本“*Trails of the Troubadours*”（《行吟诗人的行踪》），书中有这样的介绍：“行吟诗人（troubadour）在中世纪社会组织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他们兴旺的二百年（1050—1250）中，他们创立并发展了一种写作和恋爱的传统，这被但丁和皮特拉克继承过来后，变成了以后许多代文学准则的一部分。这种传统影响了一切爱情诗作家的作品，即使现在音乐厅中流行歌曲的作者也受到影响。

“他们的家在法国南部，那时的风雅中心。他们从这个宫廷流浪到那个宫廷，吟诗赞扬妇女。……”

“在那时的文雅社会中，上流男子写诗歌赞扬妇女的美超过其他一切事物，是满好的；但是上流男子应当明白，对一个上流妇女写诗和娶她为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近朱者赤”，我也写过些类似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语体诗和绝句，既不想发表，也不想藏之名山，而愿一任其消失。现在既已幸存下来，也就过而存之吧。

我在白沙女师学院课外讲演六次，集为《给少男少女》，于解放前夕印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回到故乡，写的记行诗多已丢失。一时找不到工作，我原想在家陪父亲生活一段时间，以译作谋生。许季葦先生函电约我去台北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编印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我欣然前往。因为有现成的译稿，《四季随笔》和姜译的《鸟与兽》很快就印出来了。《鲁拜集》

已经准备好付印，二·二八起义后编译馆解散，这部译稿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十多年后又得到友人抄稿，可算万幸。

我转到台湾大学外文系教书，业余译出《斯大林格勒战斗中》。台北在亚热带，白天几乎身上干不了汗，夜晚蚊虫很多，差不多很难做事。台湾大学藏的外文书很多，我原想可以多读点书补补课，不料有要逮捕我的风闻，黄猷和欧阳百川两位帮助我们全家逃出来了，经香港于一九四九年五一前夕到了天津。

一九四九年秋，我到南开大学外文系工作，渐渐担任了一些兼职，作为革命实践的锻炼，我是乐于补补课的。但从事译著的时间与精力自然就相对减少了。初期我译了《难忘的一九一九》和《山灵湖》。陆续写了些语体诗，集为《海河集》，一些杂文集为《鲁迅精神》、《纪念鲁迅先生》。一九五六年我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一员，访问了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回来写了《意大利访问记》。解放前写的格律诗编为《乡愁集》，解放后写的编为《国瑞集》，以《今昔集》的书名于一九六三年印成而未发行，销毁了。与人合译的《天演论》，因为已有语体文译本出版，译稿大概被扔进了废纸篓。原作为内部参考而与人合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史》，听说已经公开发行了。译著就量说很少，就质说很低，想起来很觉惭愧！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大有没顶之势，当然想不到什么译著了。但为苟全生命，总要抓一把“最后的稻草”。我写了约三十万字的大小字报和外调材料，我曾戏称之为“墙头文学”。这些除招来一点不大不小的灾难外，只好作为引火的材料了。

动乱稍定，据说我被“解放”了，劳改抄家已成过去，我

的手心倒有点痒痒了，但痛定思痛，只用笔练练大字搔搔痒罢了。有人劝我写点关于未名社的资料，我想倒也可以聊慰余生，便写了几篇给还肯发表的刊物。当然也有些“革命家”的眼光和嗅觉都特别锐敏，嗅出有“翻案”的气味，已经进行口诛，还未进行笔伐，可是足够闹得人心惶惶，以后听说陕西人民出版社原想将内部发行的《纪念鲁迅先生》公开印行，闻风也就作罢了。但我还私自继续写，终于集成了《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印行了。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应各地报刊的要求，我又写了些篇并无新意新事的文章，集为《华诞集》。

鲁迅先生说他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他的杂文对政治和文化革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自知没有写杂文的才能，但我很钦佩先生这种精神。解放后，报刊和广播电台常常需要所谓“赶任务”的文字，而且多半是急就篇。愿以不朽巨著传世的作家大概不乐于应命，所以他们常常找到我。我写过若干篇这样的文字，原集为《马前集》，十年动乱中散失了，我想倒也很好。有的朋友认为似乎可以选存几篇，聊备一格，我感谢她的好意，仍用《马前集》为名，并收些篇其他文字。我只写过少数篇短篇小说，原也不想收印了，也听从朋友的劝告，用原书名《影》收入几篇。

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因病住进医院，我觉得老之已至，可以工作的时间不是太多了。第二年我向南开大学提出退休的申请，想把自己的译著校改整理，挑选几本还可暂时看看的书，重印奉献给新一代的读者。一九八二年南开大学批准了我的申请。我手边几乎没有自己的译著了，散而未集印的承朋友们代为抄寄来，可以从图书馆借到的加以复印，《简爱》是朋友从香港代买的偷印本，七拼八凑，基本上都有了。要看《简爱》

的人较多，我便从这本书开始校阅，并写一篇新序。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是我的八十生辰，也是我的文学活动六十周年，市文联和作协要开一次庆祝座谈会，稍前我得到通知，要为我印行文集，我很惶恐不安，但很难谢绝，因为这是党的关怀和鼓励。座谈会举行了，成立了文集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邓元惠、张雪杉、文秉勋、陈漱渝、刘文贞、李方仲诸同志，谢国祥同志主持。这就比选印几种译著更要慎重考虑一下了。

我请文贞协助我校阅从英文直接译出的作品，从英文转译的俄罗斯和苏联作品，请方仲用俄文校阅，然后交编辑委员会审阅定稿。我大约估计一下，佚失的译著有四分之一，不再重印的也有四分之一，编印的译著可分为十四卷，译文约占三分之二的样子。每书前面一般都有序言，这里就不细说了。这篇流水账式的叙述多有与别处所说重复的地方，请读者多多原谅。

最后，我对协助我的诸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于大理道寓所。

目 录

温 暖 集

序	7
三幅遗容	11
(一) 祖 母	11
(二) 外祖母	15
(三) 母 亲	19
父 亲	24
生活的曙暮光 (Twilight)	30
忆素园	34
谈渔猎	48
忆鲁迅先生	53
听 雁	65
一夕谈	70
木 瓜	77
病	84
蟋 蟀	89
给大儿	94
许季蕖先生纪念	101
红五月引起的回忆	104
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	106
赵赤坪同志纪念	108
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随笔	116

(一) 小 引	116
(二) 非军事区与和平花	117
(三) 在前沿阵地出生入死的炊事员	123
(四) 英勇机智的汽车运输队	128
(五) 同生死共患难的友谊故事	133
(六) 访指挥部并与参谋长夜谈	141
似曾相识的杜鹃花	157
五四时期一点回忆	161
五四时期杂忆	167
忆王青士同志在未名社	172
岳麓山和橘子洲头	176
花树·诗情·乡愁	181
一点感想	186
悼念冯雪峰同志	188
春节怀台湾友人	192
漫谈文学因缘，兼为书友招魂	195
在杜甫草堂的昼梦	201
浩荡长江水，悠悠旅客情	207
悼念茅盾同志	214
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学活动	219
漫谈植树种花	227
闲话“文明礼貌”	232
在天津女师学院二三事	236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	239
从第一本书联想到良师益友	244
许季苇先生的侧影	248

“江南第一燕”	254
我所喜爱的书——《四季随笔》	258
大同——五台山——太原游记	263
同青年朋友谈谈我的青年时期	272
绿色涟漪	279
记李何林同志	282
齐白石老人二三事	288
悲欢离合话南京	291
伤四弟星野	296
元旦试笔——痴人说梦	300
江河抒情	304
春晖忆	312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	320
回忆中的北平	325
悼念常维钧同志	329
从细小处见精神	336

给少男少女

再版序	347
序	351
读书与生活	353
桃花源与牛角湾	359
至上的艺术——爱	370
试谈人生	383
“严父慈母”的新估价	399
漫谈食睡哲学，希腊悲剧，包公案，性别及其他	410